

XIANDASHIHEHUIXUEBIJIAOYANJIUCONGSHU

比较经济社会学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美〕亚瑟 L 斯廷施凯姆 著
杨小东 译

C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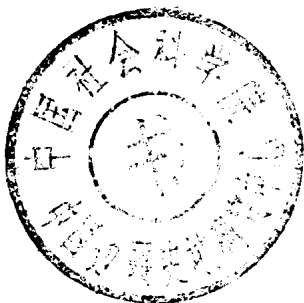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XIANDASHESHEHUIXUEBIJIAOYANJIUCONGSHU

比较经济社会学

〔美〕亚瑟·L·斯廷施凯姆 著
杨小东 译



11.16224 浙江人民出版社

Economic Sociology

Arthur L. Stinchcombe

1983

ACADEMIC PRESS

(根据美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译出)

比较经济社会学

[美]亚瑟·L·斯廷施凯姆著

杨 小 东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3 字数 241,000 印数00,001—13,5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03·254

定 价: 2.30 元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编委

顾问：陈一咨 田森

主编：何维凌

副主编：黄晓京 王文仲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晓琳 王文仲 白南风 朱竹

杜岩 李路路 何维凌 杨小东

郭亚夫 陶德荣 谢文 黄晓京

封面设计：王义钢

编 者 的 话

社会学，几年前还只是刚刚“复活”的新学科，如今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从而进入了酝酿着重大突破和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已经把“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或计划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或计划；学术界在讨论多学科研究时，也把社会学放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更使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社会文化因素或非经济因素对改革成败的重大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西方社会学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无不呈现出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互相融合的趋势，并且学科本身也在现实研究和理论思考两方面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比较借鉴。

社会生活的实际要求推动着社会学的进步。

正是现实的推动，读者的需求和老一辈社会学家的热情扶持，才使我们有勇气编辑这套《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这里的“比较”，就是借鉴；“比较研究丛书”是借鉴的窗口。通过这套系列丛书，将把经过选择的外国社会学著作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让人们评头品足，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一步开拓思维空间，加强

中外学术思想的沟通和交流，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的编撰工作以中青年社会学工作者为主体，在“现代社会学丛书编委会”指导下开展工作。

在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各学科丛书林立的今天，《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还是破土新芽，显得有些稚气。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成为丛书的批评家和赞助人，使这套稚气的丛书迅速成熟起来，成为我们大家的读书园地，并为推进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学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这一切都依靠我们的共同努力。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北京

译 序

不少读者已见过一本《经济社会学》，即1984年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社会学家高永健一的著作译本。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比较经济社会学》，则是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亚瑟·L·斯廷施凯姆1983年出版的著作翻译过来的。在本书中，作者运用宏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分属人类历史不同发展时期的三个社会——非洲卡里莫龙原始游牧社会，法国十八世纪封建晚期——资本主义早期农业社会，和现代美国工业社会——的经济运动形态和社会的经济组织结构及组织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具体说来，作者的分析是从四个主要方面展开的，即生态，技术，经济组织和组织结构中的人流。按照我国学者的习惯，可将它们粗略地分为两块：前两个方面可归入生产力的范畴，后两个方面则可归入生产关系的范畴。在运用这四种概念体系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时，作者不仅注意到了社会的有关结构及其运转过程，而且还特别着重研究了这四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处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比较，从而不仅可以使我们对这三个社会各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运动过程产生立体实感，同时还可以使我们从三个社会的比较中体察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内在逻辑关系。

全书结构严整，观点明确，文字通俗易懂，资料丰富详实。它不仅可作为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专业

的教学或科研参考书，同时还可供从事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参考。

本书初稿译出后，曾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林彬同志、人民大学外语部宋丽娜同志进行了部分校订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又曾惠蒙北京大学西语系王晨阳同志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译 者

一九八六年八月

2761/08

前 言

当我在十年前开始写此书时，原打算提供一部关于比较宏观社会学方面的大部头著作，为经济社会学奠定基础。最近，面对我实际问世的作品，我在学术出版社的编辑说，他好象一个爱斯基摩人面对着一一条被冲上岸来的鲸鱼：或许其中不乏有价值之物，但却象眼下这样，人们难以对它处置。总之，当我的煌煌巨著脱手时，比较社会学已大步转向对特定社会，或对各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性研究上了，这项工作通常以广义的“唯物”史观为基础。

既然目前似乎无人对我写的这本巨著感兴趣，我便在社会学领域中左顾右盼，以期找出我曾说过而现在依然值得一提的东西。并向人们指出，社会学已在宏观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上得到了发展。但是，依我看来，宏观社会学最难理解的部分是其物质基础本身。尽管马克思已对此给出定义。因此，我决定把此书的经济论述改成经济社会学导论，亦可把它看作是对近年来“新马克思主义”文献对社会物质基础分析的一个批判。

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可以为分析特定的现代经济制度提供理论背景，如同在分层理论课程工业和经济社会学课程，以及在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群组织的组织理论课程中那样。（从狭义上讲，大约三分之二的正规组织生活现在是在社会的经济部门

中进行的)。但是，我也希望对理论社会科学的历史分支学科（尤其是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史）以及更倾向于理论分析的历史学家的理论谈谈自己的看法。虽然比较社会学家是一个日趋没落的种类，社会人类学或许算个例外，我还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我仍然把自己算作其中的一员。

这本书的历史表明，当历史改变了合作的基础及设想时，合作性的冒险事业将会变得多么脆弱。当这本书开始着手时，它有两个合著者——人类学家尼维尔·代森-哈德森（Neville Dyson Hudson）和历史社会学家塞舍·韦特曼（Sasha Weitman）——和一个教材出版社，哈尔考特·布莱斯和世界出版社（Harcourt Brace and World）。没有合著者分别向我提供有关卡里莫龙（Karimojong）和十八世纪法国的知识，本书的说明材料将会大大减少。没有通过撰写一本教科书来发财的想法，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尝试着去勾划经济社会学基本要素的轮廓。虽然合著者从来没动过笔，虽然出版者，现名哈尔考特·布莱斯·约万诺维奇，从未在书稿上做过蓝铅笔的标记，但他们在真实的毫无夸张的意义上说都是本书的合作发起人。我可以肯定，如果合作得到继续，这本书将写得更好——那鲸鱼就会喷出水柱并潜到海底下去。

查理·梯利（Charles Tilly）和卡罗尔·黑摩尔（Carol Heimer）更类似于本书的合作者。梯利为我纠正了有关十八世纪法国的许多实际错误并在本书最后形成的样式上起了很大作用。卡罗尔·黑摩尔在如何把大量的资料组织到书中去的问题上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并提供了大量的帮助。瓦尔特·高德弗郎克（Walter Godlfrank）关于被冲上岸的鲸鱼的深刻批评帮助我下了不易作出的决心——删掉手稿的三分之二。甚至在我写这个前言时，那决定仍使我感到受了伤害。

我不再能记起所有曾提出过批评意见，曾给过我鼓励或是在我正奋力挣扎于各种思路之间时曾听我讲过课的人（这些人往往带着一种无法掩饰的疑惑表情）。所以，要将这些曾对未完成的草稿提出过意见的人一一列出似乎有点不公正。然而，我至少可以指出对改过的某些章节曾志愿做出工作的人。这些人是朱迪斯·布莱克·戴维斯(Judith Blake Davis)，贝弗雷·丹肯(Beverley Duncan)，米切尔·豪特(Michael Hout)，南希·豪威尔(Nancy Howell)，斯坦利·雷伯森(Stanley Lieberman)，小威廉·塞维尔(William Sewell)和塞达·斯考克波尔(Theda Skocpol)。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学术研究的赞助，而不管这赞助表现得多么短暂。

从我所说的这些可以明显看出，写作本书的过程常常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它已完全不同于我开始时想写的东西。然而当细细地读这本书时，我还是从中得到不少瞬间的快感。我相信这瞬间会更频繁，因为许多人曾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帮助过我。愉快和虚荣心相混杂的事实说明了我承担本书责任的原因。

在以往的日子里，作者习惯于根据读者的眼光来完成书稿的写作。这样做时，我真诚希望，并近乎于真诚地相信，读者将会由于关心它而得到益处。

于阜尔根，挪威

1982年7月

目 录

前 言

1.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	1
马克思的企业社会学	2
佩奇和农业企业	6
斯考克波尔和生产方式的政治要素	1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世界体系	17
企业和社会阶级中的角色	21
对新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23
概要	24
2. 生态学	28
环境与社会	28
行为的外在经济性	33
介入一个环境	34
行为的生态学分析	35
生态组织和分层	37
卡里莫龙社会的生态学	39
法国社会的生态学	51
美国社会的生态学	74
经济社会中自然界的角色和生态学	91
3. 技术和对环境的控制	97

技术的社会影响	97
卡里莫龙的畜牧技术	106
十八世纪的法国：谷物技术和帝国野心	113
美国：现代技术和受过学校教育的实践者	125
技术和社会结构	144
技术的一般构成要素	149
4. 经济组织	154
财产制度	155
财产权利在管理系统中的配置	160
劳动市场的社会结构	162
利益的划分	165
收入的流动	167
概要	169
卡里莫龙的经济组织	171
旧政体中的劳动组织	182
美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196
生产的社会关系	213
5. 社会结构中的人流	224
人口理论	224
卡里莫龙的社会连续性	242
十八世纪法国的农业人口组织	256
美国社会的人口和劳动力	268
人口和经济	284
6. 建立有关生产方式的理论	295
什么样的社会单位有生产方式?	295

具体的社会形式	300
对社会破坏力组成方式的附论	304
经济学、个人动机和制度上的变异性	307
阶级关系当中的社会变异性	310
参考文献	315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

本书有三个略带矛盾的目的。首要的目的，是向学生介绍经济社会学的主要概念。我特别想以这样的方式来介绍经济社会学，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对整个社会的宏观结构进行分析。在当代社会学中，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用途就在于为解释分层和阶级冲突，或为解释一个社会政治的长期发展提供基础。经济社会学部分地应按照这样的要求来构造。

第二个目的是通过分析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三个社会来说明经济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的应用。这三个社会是：原始畜牧社会，晚期封建社会或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现代社会。我相信如果人们把这些原则用到特定社会的具体形象中和各种理论的形式中，他们就能够熟记这些原则，而列举出的那些社会的形象则应该尽可能地有所不同。

第三个目的是对大量出现的文献进行批判；这些文献在用经济社会学理论解释宏观社会现象时，大部分都沿袭着马克思的传统方法。

我认为由于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现象本身的兴趣要比对这些现象的结果兴趣小，他们就在分析中留下了较大的漏洞。如果不对经济进行充分的分析，就无法正确地分析由经济现象

*本章略有删节。——译注

所导致的社会与政治形态。

在这一节导言里我试图说明卡尔·马克思对经济分析的贡献的核心，以及这个贡献在现代新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发育不全怎样导致了理论上的困境。我将分析杰弗利·佩奇(Jeffery Paige)的《农业革命》，塞达·斯考克波尔(Theda Skocpol)的《国家和社会革命》，伊曼奴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艾利克·奥林·莱特(Erik Olin Wright)的《阶级结构和收入的不平等》。然后我对本书其余部分章节的组织将作出简明的解释。

马克思的企业社会学

马克思思想的一般战略是通过运用经济企业的理论（如资本，对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榨取）把经济生活的集聚运动（例如，利润率的下降）和对个人或对商行的压力（机器取代劳动的压力）联系起来。这就是说，经济社会学是通过审查制度的类型和社会谋求生计的技术限制把经济力量的巨大运动和个人行为连接在一起的。

马克思在其经济决定论中的创见在于通过从两方面同时进行分析的方式来描绘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一方面是工资、价格和利润在社会或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如何对特定企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形成刺激（这些刺激的结构构成了“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这些刺激和压力结合着生产本身的社会和技术安排（“生产力”）如何产生出经济的结构和社会结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工厂当作社会单位来代替古典经济理论中虚构的经济人。

在经济的制度单位方面的现实主义态度十分有利于把经济

动力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这可能也是马克思发展其策略的主要原因。只有搞清楚了资本家所面临的是怎样一些刺激和公开的抉择，马克思才可能预见到他们在斗争中会采取什么步骤。只有了解了资本家向工人施加了什么压力以及技术为工厂的工人组织带来了怎样的机会，马克思才可能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作出预见。马克思曾错误地预言资本家的行动方向（或是列宁在其后预言资本主义政府将拚死保住它们的殖民地）的事实并不能抹杀马克思主要洞见的威力，也即是说，正是经济企业的制度结构把经济的巨大涨落转化为对扮演不同经济角色的个人的刺激和压力。

按照这种方式定义阶级利益，马克思便从制度秩序在企业层次上的运转中得出了改变这种秩序的特定阶级的动机。例如，当奥地利贵族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进行强制性传统劳动和工资劳动的效率“研究”并发现工资劳动所生产的要比强制性劳动所生产的多二一三点五倍时，这便形成了在农业生产中重新组织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农奴制”到“工资劳动”的劳动关系的压力。这是由于技术的有效合作生产通过工资刺激系统来组织要比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容易得多^①。这就是说，在企业的层次上封建劳动关系加诸于生产效率之上的“镣铐”在土地所有者中产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但是，仅仅在市场给出劳动和农业生产的明确标价时，这种计算结果才可能产生，而也只有当自由工资劳动在农业中具有制度化的可能性时，这种试验才能够进行。也就是说，只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性机遇下，在一个社会整体中以及在企业自身中将阶级关系结构改变为资本主义形态的压力才可能在封建性企

^①见让·罗姆·布鲁姆《1815—1840年奥地利的贵族地主和农业》第192—202页。